

3
鲁 迅

花 边 文 学

鲁迅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序 言

我的常常写些短评，确是从投稿于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談》上开头的；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，就有了《伪自由書》和《准風月談》两本。后来編輯者黎烈文先生¹真被挤轧得苦，到第二年，終于被挤出了，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，但为了赌气，却还是改些作法，換些笔名，托人抄写了去投稿，新任者不能細辨，依然常常登了出来。一面又扩大了范围，給《中华日报》的副刊《动向》²，小品文半月刊《太白》³之类，也間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。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，就是这一本《花边文学》。

这一个名称，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，換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給我的。那立意非常巧妙：一，因为这类短评，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圍繞一圈花边以示重要，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；二，因为“花边”也是銀元的別名⁴，以見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，其实并無足取。至于我們的意見不同之处，是我以为我們無須希望外国人待我們比鷄鴨优，他却以为應該待我們比鷄鴨优，我在替西洋人辯护，所以是“买办”。那文章就附在《倒提》之下，这里不必多說。此外，倒也并無什么可記之事。只为一篇《玩笑只

当它玩笑》，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先生⁵的来信，笔伐的更严重了，說我是“汉奸”，現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。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，躲躲閃閃的攻击，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，这里都不轉載了。

“花边文学”可也真不行。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，今年是为了“閑話皇帝”事件⁶，官家的書報檢查处⁷忽然不知所往，还革掉七位檢查官，日报上被刪之处，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（术语謂之“开天窗”）了。但那时可真厉害，这么說不可以，那么說又不成功，而且刪掉的地方，还不許留下空隙，要接起来，使作者自己来負吞吞吐吐，不知所云的责任。在这种明誅暗杀之下，能够苟延殘喘，和讀者相見的，那么，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？

我曾經和几个朋友閑談。一个朋友說：現在的文章，是不会有骨气的了，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，副刊編輯先抽去几根骨头，总編輯又抽去几根骨头，檢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，剩下来还有什么呢？我說：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，否則，連“剩下来”的也不剩。所以，那时發表出来的文字，有被抽四次的可能，——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，幸而他們是宋明人，如果活在現在，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从知道的。

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，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气的文章。我生于清朝，原是奴隶出身，不同二十五岁以內的青年，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，然而他們不經世故，偶尔“忘其所以”也就大碰其釘子。我的投稿，

目的是在發表的，當然不給它見得有骨氣，所以被“花邊”所裝飾者，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，而且奇怪，被刪掉的地方倒很少。一年之中，只有三篇，現在補全，仍用黑點為記。我看《論秦理齋夫人事》的末尾，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，別的两篇，却是檢查官刪的：這里都顯着他們不同的心思。

今年一年中，我所投稿的《自由談》和《動向》，都停刊了；《太白》也不出了。我曾經想過：凡是我寄文稿的，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，假使接連不斷，它就總歸活不久。於是從今年起，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，因為對於同人，是迴避他背後的閹棍，對於自己，是不願做開路的呆子，對於刊物，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長生。所以有人要我投稿，我特別敷衍推宕，非“擺架子”也，是帶些好意——然而有時也是惡意——的“世故”：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。

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，這才看見了新聞記者的“保護正當輿論”的請願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。要過年了，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。然而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眾的喉舌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：是北五省的自治。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懸請“保護正當輿論”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，是東三省的淪亡。不過這一次，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。然而，倘使萬一不幸，後來又復換回了我做“花邊文學”一樣的时代，大家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麼罷……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，魯迅記。

未来的光荣¹

張承祿

現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，一到中国，总惹出一点小乱子。前有蕭伯納²，后有德哥派拉³；只有伐揚古久列⁴，大家不願提，或者不能提。

德哥派拉不談政治，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，不料因为恭維了食与色，又掙得“外国文氓”的恶諺⁵，讓我們的論客，在这里議論紛紛。他大約就要做小說去了。

鼻子生得平而小，沒有欧洲人那么高峻，那是沒有法子的，然而倘使我們身边有几角錢，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。偵探片子演厭了，愛情片子烂熟了，战争片子看膩了，滑稽片子無聊了，于是乎有《人猿泰山》，有《兽林怪人》，有《斐洲探險》等等，要野兽和野蛮登場。然而在蛮地中，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綫。如果我們也还爱看，那就可見無論怎样奚落，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，“性”之于市僧，是很要紧的。

文学在西欧，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；有些所謂文学家也者，也得找寻些奇特的(grotesque)，色情的(erotic)东西，去給他們的主顧滿足，因此就有探險式的旅行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請酒。然而倘遇呆問，則以笑話

了之，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，他也不必知道。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中之一人。

但中国人，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，是要和各种所谓“土人”一同登场的，只要看报上所載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——中国，南洋，南美。英，德之类太平常了。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，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，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。

一月八日。

女人未必多說謊¹ 赵令仪

侍桁先生在《談說謊》²里，以为說謊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，那举証的事实，是：“因此为什么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来得多。”

那并不一定是謊話，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。我們确也常常从男人們的嘴里，听說是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多，不过却也并無实証，也沒有統計。叔本华先生痛罵女人³，他死后，从他的書籍里發見了医梅毒的藥方；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⁴，我忘記了他的姓氏，做了一大本書，說女人和謊話是分不开的，然而他后来自杀了。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經病。

我想，与其說“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来得多”，不如說“女人被人指为‘講謊話要比男人来得多’的时候来得多”，但是，数目字的統計自然也沒有。

譬如罢，关于楊妃，祿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謊，玄宗逍遙事外，倒說是許多坏事情都由她，敢說“不聞夏殷衰，中自誅褒姒”⁵的有几个。就是姒己，褒姒，也还不是一样的事？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，真是太长远了。

今年是“妇女国貨年”⁶；振兴国貨，也从妇女始。不

久，是就要挨罵的，因为国貨也未必因此有起色，然而一提倡，一責罵，男人們的責任也尽了。

記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鳴不平的詩道：“君王城上豎降旗，妾在深宮那得知？二十万人齐解甲，更無一个是男兒！”⁷ 快哉快哉！

一月八日。

批評家的批評家¹ 倪朔尔

情勢也轉變得真快，去年以前，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，自然，不滿的居多，但說好的也有。去年以來，卻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，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。

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，最徹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真的批評家。即使承認，也大大的笑他們胡塗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，合就好，不合就壞。

但是，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？都有的，或者是美的圈，或者是真實的圈，或者是前進的圈。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，那才是怪漢子呢。辦雜誌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，而其實這正是圈子，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。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，他盡可以自說并無定見，單在書籍評論上，就足夠玩把戲。倘是一種所謂“為藝術的藝術”的作品，合於自己的私意的，他就選登一篇贊成這種主義的批評，或讀後感，捧著它上天；要不然，就用一篇假急進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評家的文章，捺它到地裡去。讀者這就被迷了眼。但在

个人，如果还有一点記性，却不能这么两端的，他須有一定的圈子。我們不能責备他有圈子，我們只能批評他这圈子对不对。

然而批評家的批評家会引出張献忠考秀才²的古典来：先在两柱之間横系一条繩子，叫应考的走过去，太高的杀，太矮的也杀，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。这么一比，有定見的批評家即等于張献忠，真可以使讀者發生滿心的憎恨。但是，評文的圈，就是量人的繩嗎？論文的合不合，就是量人的长短嗎？引出这例子来的，是誣陷，更不是什麼批評。

一月十七日。

漫 罵¹ 倪朔尔

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，是说所谓批评家好“漫骂”，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。

这“漫骂”，有人写作“嫚骂”，也有人写作“謾骂”，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含义。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。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“漫骂”。

假如指着一个人，说道：这是婊子！如果她是良家，那就是漫骂；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，就并不是漫骂，倒是说了真话。诗人没有捐班，富翁只会计较，因为事实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是真话，即使称之为漫骂，诗人也还是捐不来，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。

有钱不能就有文才，比“儿女成行”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。“儿女成行”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，还会养，却并無妄谈儿童的权利。要谈，只不过不害羞。这好像是漫骂，然而并不是。倘说是的，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，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。

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，是冤枉儿童的，其实是漫骂。儿童的行为，出于天性，也因环境而改变，所以孔融会让梨²。打起来的，是家庭的影响，便是成人，不

也有爭家私，奪遺產的嗎？孩子學了樣了。

漫罵固然冤屈了許多好人，但含含糊糊的撲滅“漫罵”，
却包庇了一切壞種。

一月十七日。

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¹ 樂廷石

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揚“京派”而抑“海派”之言，頗引起了一番議論。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，且引別一某先生的陈言，以为作者的籍貫，与作品并無关系，要給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。²

其实，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。所謂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，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，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，故“京派”非皆北平人，“海派”亦非皆上海人。梅兰芳博士，戏中之真正京派也，而其本貫，則为吳下。³但是，籍貫之都鄙，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，居处的文陋，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，孟子曰：“居移气，养移体”⁴，此之謂也。北京是明清的帝都，上海乃各国之租界，帝都多官，租界多商，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，没海者近商，近官者在使官得名，近商者在使商获利，而自己也賴以糊口。要而言之，不过“京派”是官的帮閑，“海派”則是商的帮忙而已。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隱，对外尙能傲然，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，到处难于掩飾，于是忘其所以者，遂据以有清浊之分。而官之鄙商，固亦中国旧習，就更使“海派”在“京派”的眼中跌落了。

而北京学界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，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。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，但当时的战士，却“功成，名遂，身退”者有之，“身稳”者有之，“身升”者更有之，好好的一场恶斗，几乎令人有“若要官，杀人放火受招安”⁵之感。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，前年大难临头，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，而惟一大事，则是古物的南迁，⁶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？

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，且有古书，且有古都的人民。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，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，论理，研究或创作的环境，实在是比“海派”来得优越的，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，或文艺上的大著作。

一月三十日。

北人与南人¹ 樂廷石

这是看了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的議論之后，牽連想到的——

北人的卑視南人，已經是一种傳統。这也并非因为風俗習慣的不同，我想，那大原因，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，先征服中国之北部，又携了北人南征，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，也是被征服者。

二陆入晋，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，分明带着輕薄²，举証太煩，姑且不談罢。容易看的是，羊街之的《洛陽伽藍記》中，就常詆南人，并不視為同类³。至于元，則人民截然分为四等⁴，一蒙古人，二色目人，三汉人即北人，第四等才是南人，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。最后投降，从这边說，是矢尽援絕，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⁵，从那边說，却是不識順逆，久梗王师的賊。孑遺⁶自然还是投降的，然而为奴隶的資格因此就最淺，因为淺，所以班次就最下，誰都不妨加以卑視了。到清朝，又重理了这一篇賬，至今还流衍着余波；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，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。

当然，南人是有缺点的。权貴南迁，就帶了腐敗頹廢

的風气来，北方倒反而干淨。性情也不同，有缺点，也有特长，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。据我所見，北人的优点是厚重，南人的优点是机灵。但厚重之弊也愚，机灵之弊也狡，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点道：北方人是“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”；南方人是“群居終日，言不及义”。⁷就有閑階級而言，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。

缺点可以改正，优点可以相师。相書上有一条說，北人南相，南人北相者貴。我看这并不是妄語。北人南相者，是厚重而又机灵，南人北相者，不消說是机灵而又能厚重。昔人之所謂“貴”，不过是当时的成功，在現在，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。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。

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，北方却受了影响。北京的報紙上，油嘴滑舌，吞吞吐吐，顧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嗎？这倘和北方固有的“貧嘴”⁸一結婚，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！

一月三十日。

《如此广州》讀后感¹ 越 客

前几天，《自由談》上有一篇《如此广州》²，引据那边的报章，記店家做起玄壇和李逵³的大像来，眼睛里嵌上电灯，以镇压对面的老虎招牌，真写得有声有色。自然，那目的，是在对于广州人的迷信，加以諷刺的。

广东人的迷信似乎确也很不小，走过上海五方杂处的街堂，只要看畢畢剝剝在那里放鞭炮的，大門外的地上点着香烛的，十之九总是广东人，这很可以使新党嘆气。然而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認真，有魄力，即如那玄壇和李逵大像，恐怕就非百来塊錢不办。汉求明珠，吳征大象，中原人历来总到广东去刮宝贝，好像到现在也还没有被刮穷，为了对付假老虎，也能出这許多力。要不然，那就是拚命，这却又可見那迷信之認真。

其实，中国人誰沒有迷信，只是那迷信迷得沒出息了，所以別人倒不注意。譬如罢，对面有了老虎招牌，大抵的店家，是总要不舒服的。不过，倘在江浙，恐怕就不肯这样的出死力来斗争，他們会只化一个銅元买一条紅紙，写上“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”⁴或“泰山石敢当”⁵，悄悄的贴起来，就如此的安身立命。迷信还是迷信，但迷得多少小